

中国

抗日战争史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战时经济
与社会

【第六卷】

李学通 金以林 吕迅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8253-8



定价：1580.00 元（全八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史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第六卷

战时经济与社会

李学通 金以林 吕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战前工业状况与战时体制的建立	005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的经济备战	006
第二节 紧急应对措施与工业内迁	029
第三节 战时体制与财经方针	042
第二章 后方经济的发展（上）	057
第一节 建设后方工业	057
第二节 推进农业生产	133
第三节 战时财政金融	150
第三章 后方经济的发展（下）	162
第一节 战时交通与运输	162
第二节 发展对外贸易	177
第三节 对日经济作战	190
第四章 危机与应对	197
第一节 通货膨胀与田赋征实	197
第二节 工矿业的衰退与调整	208
第三节 挽救危机的措施与效果	220

第五章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	249
第一节 减租减息运动	250
第二节 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	260
第三节 公私兼顾发展根据地工商业	266
第四节 合理负担的财税政策	273
第六章 战时的移民问题	283
第一节 文教内迁	283
第二节 难民内迁	304
第七章 战时教育体制的变革	315
第一节 教育政策的论争 ——“战时教育平时看”	315
第二节 伟大的战时教育救济	319
第三节 战时教育改革及其成果	326
第四节 教育统制中的“党化教育”	343
第五节 战后复员	353
第八章 战时大后方电影的发展	359
第一节 官营电影制作优势地位的确立	359
第二节 对电影社会属性和教育功能的高度强调	365
第三节 电影检查制度的延续与调整	371
第四节 电影放映向农村乡间普及	379
第九章 战时的市民生活	385
第一节 海上“孤岛”	385
第二节 江边山城	394
第三节 白云之南	404
第四节 清凉山下	414

第十章 战时的社会动员	426
第一节 精英与民众	426
第二节 政党与宣传	439
第三节 国家与家庭	457
第四节 自由与统合	463
第十一章 战时的民族认同	474
第一节 外国人观	474
第二节 “汉奸”现象	487
第三节 少数民族	500
主要参考文献	511
人名索引	524

前 言

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一方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疯狂掠夺，使中国遭到空前的创伤，损失惨重，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不屈，玉汝于成，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以惊人的代价、惨烈的牺牲，有效地支撑了抗战，成为中国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保障。同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内迁、工厂内迁和文化教育内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动力。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而在广阔的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化工矿企业和工业门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毁于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夺。为了保存中国赖以坚持抗战的有生力量，民族工商业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辛，内迁大后方。国民政府也积极协助工矿企业内迁。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移，不仅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严重不合理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初期的民族工业内迁，是中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一项重大工程。据统计，整个内迁工厂多达 600 余家。这些工厂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机器设备精良，技术比较先进，特别是大量技术工

人的内迁，为内地工业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有力推动了大后方经济发展。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南、广西七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03%，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04%。^①1943年，大后方的工厂数已达4524家，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总额增加了164倍。^②

1938年4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③这一经济纲领，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调整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有利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水陆交通建设得到开拓，农业技术推广日渐深入。同时，它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虽然，“这种发展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必然结果，但是，相对于被打断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发展和变化的确是新的现代化因素的积累”。^④

伴随着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的同时，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也大举迁入内地。近代中国的大学布局同工业布局一样十分不合理。无论是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主办的大学，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据统计，战前全国共有高等学府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了46所，在校学生约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3。中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教育文化中心。

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纷纷辗转内迁大后方，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继续办学。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学的内迁几乎从未间断过。

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平津两地方6所大学分别迁往长沙和西安。迁往长沙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正式开学，到校学生1400多人，到校教师150多人。同年12月，长沙临大又奉教育部之命，迁往云南昆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第95、97页。

② 黄秉维：《五十年来之中国工矿业》，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编者印行，1948，第181页。

③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1，第357页。

④ 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50页。

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营可称极一时之选。学校在极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迁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又令西北联合大学的各个学院独立，分为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它对全国的影响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大。

随后，东南沿海地区等许多高等学校也陆续内迁。“战时内迁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四省。其中四川最多，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贵州原来连一所大学也没有，此时则云集了众多著名学府。”^① 这些内迁院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许多成绩，并且对推动西南、西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不少家住沦陷区的广大爱国青年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国民政府在后方陆续开办了不少国立高中。同时，对于来自沦陷区的大专及中学学生，政府大都给以贷金，后改为公费。战前，学生读书“年须数百元，非富有之家，无力送子弟入学，以至高等教育过于贵族化，不合平民主义的原则”。^② 那时，贫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学，也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战时的贷金制度，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继续求学，而且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和公费制度，享受高等教育。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③

1938年，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东南沿海的大学生。“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的约30%。”^④

为了躲避战火，还有更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纷纷从战

①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249页。

② 钟鲁齐：《长期抗战与吾国高等教育几个当前的问题》，《教育杂志》第28卷第2号，1938年2月，第18页。

③ 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总第12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79页。

地和沦陷区向大后方迁徙。据社会学者对知识分子内迁的估计，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①这一群体因为受过相当的教育，经济条件也使他们有可能长途迁徙，因而在同一群体中内迁比例最高。此外，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在内迁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适应性强，谋生较为容易。而广大农民在内迁人口中所占比例最低，这是由于他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土地这一特殊条件。战时内迁人口“至今没有完全的统计。但有着从一千数百万人直至五千万人的种种不同的估计。一般认为，约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②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人口大迁移。

一个民族的形成，最根本的条件是要有共同的经济文化联系，共同的活动地域乃至共同的血缘关系，经过相互沟通形成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抗日战争所起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难以比拟的。在各界社会精英、政党共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下，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战时得到了空前增强。以沿海工业、文教机构内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对于矫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状态，客观上起到了出乎时人意料的作用；战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巨大需求，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方民族工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受战争影响，这种变化发展又多形成于临时被动的危机应对状态下，并非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而且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国民党“党化教育”等战时统治的限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贻害甚深。但无论如何，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源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本卷由李学通、金以林、吕迅共同撰稿。具体分工如下：李学通撰写第一至五章；金以林撰写前言、第六章第一节、第七章，并负责第六至十一章的补充修改；吕迅撰写第六章第二节、第九至十一章；汪朝光提供第八章初稿。由于作者学识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①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3，第261页。

^②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1997，第81页。

第一章

战前工业状况与战时体制的建立

经济利益的对抗性矛盾和冲突是导致战争的最深刻根源，而经济也是支撑战争的基础和推动战争的动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既是这一时期中国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等活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支撑点。

抗日战争时期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中也是一个极特殊的阶段。一方面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摧残和疯狂的经济掠夺，使中国经济遭到空前的创伤，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阻断了中国经济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战火硝烟之中的抗战大后方与敌后根据地经济，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不屈，玉汝于成，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以巨大的代价、惨烈的牺牲，有效地支撑了八年抗战，成为中国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保障。以沿海工业内迁为标志的中国经济中心的转移，对于矫正中国近代经济布局的畸形状态，客观上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而战时军用民生的巨大需求，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培养和训练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但是，这种变化和发展更多是被动的、临时的危机应对，并非中国近代经济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而且国家垄断资本急剧膨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遗害甚深。

全国抗战爆发之时，中国尚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与已完成了工业化的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实施紧急应对措施，组织沿海工业企业内迁；另一方面积极调整政府经济主管机构，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提出“抗战与建国同时并举”的基本方向和一系列战时经济政策，推动国民经济向战时转轨。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的经济备战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场抗日战争中，尚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与已完成了工业化的日本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 战前工业状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空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欧美日各国竞相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嫁危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升级，中国国际经济环境极不乐观。南京政府为克服经济危机，增强抵抗实力，扭转不利形势，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应对，如实施币制改革，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国营工矿交通事业发展等，以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能力，特别是提出并确定国民经济中心于内地和以国防为中心的腹地经济建设计划。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为指针，倾慕统制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逐渐向统制经济方向强化。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业化程度极低。总体而言，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工业的数量与规模还很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很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新式工业区域分布呈现畸形状态，主要集中于上海、天津等几个沿海沿江大都市。据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于1933年对中国工业所做的普查统计，当时全国合于《工厂法》，雇工在30人以上，使用机械动力的工厂共有2435家（包括未调查地区在内不超过3000家），资本额406926634元，工人493257人，产品总值1113974413.02元。^①特别是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1930年代初期，中国民营工业发展处于停滞和衰退的状态。随着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成功，1935年以后民营工业出现转机，经济呈现恢复和发展的态势。

1936年登记的工厂数为2441家，是年新增工厂193家。其中纺织业

^①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资源委员会，1937，第64、291、428页。

40家，饮食业75家，机器业、皮革业、服装业11家，火柴业6家，电工器材业4家。工业生产也有明显发展，与1935年相比，1936年棉纱生产增长65.63%，棉布增长17.7%，火柴增长300%，卷烟增长70.23%。^①工业产值也从1931年的108亿元，1932年的96亿元，1933年的88亿元，1934年的82亿元，1935年的89亿元，恢复到1936年的102亿元。^②又据实业部统计，至1937年9月底，中国共有符合《工厂法》的企业3849家。^③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32年为288亿元，1933年为242亿元，1934年为213亿元，1935年略有回升，为237亿元。^④即使如此，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集中于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国工业基础依然极为薄弱，每年所需的机器，平均76%依靠进口，车辆船舶83%依靠进口，光学仪器、通信设备的生产几乎为零。特别是重工业，产量甚微，钢铁95%依靠进口，制造火炮的特种钢材和制造枪炮壳的铜材，化学、石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重化工业不仅不发达，有些甚至是空白。

表 1-1 1936 年中国主要工业数据

行业	资本(万元)	重要工厂数(家)	产品	数量	附注
棉纺织	15000	96(中国企业)	棉纱	3200000件	共有510万锭
		48(外国企业)			
面粉	2700	94	面粉	61941612袋	
火柴	1200	71	火柴	880000箱	
水泥	1500	9	水泥	4500000桶	生产能力为700万桶
机器	800	270		自备动力	2455马力
电力	7400			680000瓦	
化学	1400	200余	肥皂		
		45	纸张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163页。

② 〔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44页。

③ 林继庸：《战时后方民营工业动员》，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编《战时工业》，重庆出版社，2014，第37页。

④ 〔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244页。

续表

行业	资本(万元)	重要工厂数(家)	产品	数量	附注
钢铁				生铁 30 万吨	辽宁, 日本企业
				生铁 5000 吨, 土铁 12 万吨	

资料来源: 翁文灏著《中国经济建设概论》, 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 1943, 第 10—11 页。除注明者外, 均不包括东北四省数字。

表 1-2 1936 年中国矿业产量

单位: 吨

矿产种类	产量	矿产种类	产量
煤	20000000	锡	10000
铁砂	1500000	汞	50
金	300000 (两)	砒矿	1000
铜	500	石膏	50000
铅砂	5000	明矾	11000
锌砂	10000	自然碱	17000
钨砂	12000	硫黄	6000
锑	10000	食盐	3000000

资料来源: 同表 1-1。

据吴承明估计, 1936 年中国 (不包括东北和台湾) 投入新式工业的资本只有 21 亿元左右。从资本的使用分配来看, 用于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 包括冶炼、机器、化学、建筑材料等行业, 仅占总资本额的 20%; 用于制造生活资料的资本占到 80%, 其中又以纺织和食品行业所占最多, 达到 53%, 而且化学和金属品行业实际上也有很大部分是制造生活资料。^① 而同一时期, 日本钢产量为 309.7 万吨, 生铁产量为 203.1 万吨, 煤产量为 3000 万吨; 有工厂 106005 家, 工人 293.7 万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升级, 1932 年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事变, 把战火引到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随后, 日军又向热河及长城沿线进攻, 占领了山海关、热河, 甚至深入冀东, 包围平津。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 将“剿共”视为首

^①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第 9—11 页。

要，对日本侵略行为采取“不扩大”势态方针，但同时也对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经济备战方面的具体工作，以军事委员会所属资源委员会主持的国防重工业建设为核心，另外还包括币制改革、公路整理与铁路建设等。虽然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工作因为时间匆促等原因未及充分展开，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些工作对于战争初期迟滞日本侵华步伐，特别是对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建设，形成支撑抗战的经济基础，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筹建国防工业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于1932年春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同年冬，蒋介石以“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又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蒋介石任参谋总长）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画，从事建设”。^①该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委员长，邀请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秘书长，蒋介石的秘书钱昌照则以副秘书长名义在南京主持具体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外保密，以其所在办公地点指称为“南京三元巷2号”。

（一）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调查与筹划

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为工作范围，^②除行政院各部会负责人均为当然委员外，另聘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专家学者40余人为委员，按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专题，分别从事相关国防调查与设计工作。受聘担任该会委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丁文江、曾昭抡、陶孟和、刘大钧、蒋梦麟、王世杰、胡适、蒋廷黻等，以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顾振、张嘉璈、徐新六、吴鼎昌、吴蕴初、范旭东等。该会还聘任技术专家为专门委员，从事与国防建设有关的具体研究工作，如王守竞、高宗熙、叶企

^① 程玉凤、程玉凰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册，台北，“国史馆”，1984，第16页。

^② 《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上册，台北，“国史馆”，1984，第18页。

孙、吴有训等。^①内部分设秘书、调查、统计三处和军事、国际关系等工作小组。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秘书长翁文灏为该会提出四大工作目标：一是外交及国际调查；二是国防科学的研究；三是拟订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四是策划临时应变措施。他非常重视建设之前进行科学的调查与研究，他说：“古人说：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现在可以说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在前清末年的建设事业，差不多都是毫无计划，贸然实行，所以用力虽大而成效甚微，甚且还引起许多危险。”^②翁并提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在于“有一个整个计划，平衡进行，彼此皆有产销、供求及运输等连带关系”，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汇集政府各机关以往的“各种建设计划（尤其是实业、铁道、交通各部的）及其计划的技术的根据……详加研究”，“本会现方搜集各种材料，倘能于一二年内将有关国防之经济建设拟出一种轮廓，亦可为一重要工作矣”。他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要从未来发生对外战争的实际出发，争取在一二年内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要调查一旦有“国际军事”，中国所需军工原料，例如，硝矿、钢铁等，“究竟现在需要若干，用何方法供给？照现在所计划的，应需若干，品质如何？”既要设法调查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还要搜集学术研究机构已做的、与建设计划有关的各种调查研究材料，例如各种矿产报告等，使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成为资料中心。^③

至1934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之前，国防设计委员会各个工作小组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形成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参考。与经济 and 工业建设相关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与财政组工作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主持，进行财政制度与状况的调查；与中央研究院共同研究改进田赋和税收问题；向海关等部门调查了解中国国际贸易情况；研究战时粮食供求平衡办法，各种必需物资的代替、补充、购买，以及对国防必需品限制外流、奖励进口的方法等；派人赴欧洲考察各国货币制度，参与研究中国币制改革。

①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193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称“二档馆”）藏档：廿八全宗/18733卷。

② 翁文灏：《建设与计划》，《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第12页。

③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二档馆藏档：廿八全宗/18733卷。

原料与制造组的工作，一是在翁文灏、丁文江主持下，由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进行中国矿产资源及其战时开发利用的调查和设计；二是在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主持下，由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 145 个重要工业县市的雇工 30 人以上、使用动力的 2435 个工厂进行调查统计，编制《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矿产资源调查的重点是关涉国家战略资源的金属矿、煤矿、石油矿。金属矿方面，如四川、青海的金矿，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福建的铁矿，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的铜矿，湖南、广西的铅锌矿，湖南、江西的钨锑锰矿，云南的锡及钨锑矿，浙江矾土矿等。煤矿的调查，一是对沿铁路、长江已开发的煤矿，详细调查其生产运销状况，作为战时燃料统制的准备；二是调查在内地发展重工业需要新开或扩充的煤矿，如江西萍乡、高坑、天河及湖南谭家山等矿。液体燃料、石油方面，包括对国内石油供需情形和陕北、四川石油天然气进行调查及钻探；地质调查所从事无烟煤低温蒸馏试验。此外，还有对浙东、四川水力，黄河壶口水力，甘肃黄河水力，长江上游水力的调查，以及对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等，形成了《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四川水力发电计划》等众多调查报告和开发计划。

运输与交通组的调查工作，分为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个部分进行。该小组对全国主要铁路的车站、站台、机车等设施和技术设备，以及各种行车备料，如钢轨、枕木、路基、桥梁、坡道的改进，货车的生产能力，应付战时轰炸造成的火灾和事故的设备、铁路医院的设备与能力、铁路的守备，以及铁路工人的招募及劳务纠纷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全国现有公路正在营运的汽车种类及数目，汽车修理厂、修理点、加油站的数目，机动车的税费征缴等进行了调查，提出了第一期修建 87 条公路和第二期修建 21 条公路的分期建设计划。该小组还拟定了战时运输和电讯计划，编订了《全国铁路军事运输能力报告》、《运输动员及统制初步计划》等多项调查报告和战时计划。

土地及粮食组以人口与农业调查为主，包括土地分配制度，地价与地租，地主与雇工关系，全国农产品的产量、库存量、运输与消费等，对长江流域 6 省农政、地政进行了调查；还进行了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总人口的测算，以及户籍行政调查、军人体格研究等。该组拟定有《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等报告。